

# 新旧之间：卫西琴在民初思想界的浮沉

邱念洪

**【摘要】**1914年德国人卫西琴因《中国教育议》在中国发表,借助译者严复的名声,一时瞩目于中国思想界。他的“新教育”理念既包含了欧洲最新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成果,又包含了各种尊孔的言论。数年间,卫西琴受邀到各处演讲,受到了思想界持续的关注。事实上,卫西琴的“新教育”自成一派,并不能回应时人所热衷的“教育救国”理想,他的尊孔言论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儒学也不一致。随着新文化的崛起,卫西琴的尊孔言论又被当作守旧余孽受到了新派的批判。民初思想界中无论是主张恢复传统以挽救人心的人士,抑或是主张学习西方进行教育改革的人士都能在卫西琴的言论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内容,原因在于时人对于何谓新文化、何谓旧文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所谓的新旧之争有时并不取决于观点的不同,而是取决于立场的不同。

**【关键词】**卫西琴;新教育;严复;尊孔;新旧之争

**【作者简介】**邱念洪,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

**【原文出处】**《近代史学刊》(京),2023.第29辑.227~243

“有一个什么卫西琴,从前在袁皇帝时代,就揣摩中国人复古的心理,做了一本什么教育学;说中国以前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孔子的道理,是‘传诸百世而不惑,放诸四海而准’的道理……做好之后,请了一位‘君子’把他翻译出来。于是一班‘夸大狂’的中国人眉飞色舞,以为中国的学问真好,外国人都佩服。”<sup>①</sup>1919年,罗家伦于其发表在《新潮》中的一篇文章里毫不掩饰地讥讽了一位名叫卫西琴的人。罗家伦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学生刊物《新潮》的创始人之一,他在该刊上讽刺卫西琴究竟有何缘由?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卫西琴在民初数年间发表的言论中多表现出对孔子学说的尊崇,随着“新文化”“新思潮”逐渐成为民初社会的主流思潮,他的尊孔言论自然被主张新文化的新派人士当作攻击的对象。尊孔的人士在民初并不在少数,卫西琴被罗家伦注意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其身份的特殊性。卫西

琴本为德国人,他不仅在华多年,积极为中国教育改革建言献策,与民国政、学两界的知名人物多有来往,包括严复、阎锡山、梁漱溟等人,甚至后期还加入了中国国籍。

卫西琴,原名 Victor Egon Frensdorf, 1882年出生于德国柏林,1907年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主修音乐学和心理学。<sup>②</sup>获得博士学位后,卫氏前往法国,旅法期间接触到《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发现当中的内容与其在音乐中感悟到的“心理见解”相一致。离法赴英后,卫氏又于英国遇到了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蒙台梭利以其独特的幼儿教育法于20世纪初蜚声西方世界。卫西琴认为蒙台梭利的教育学中强调发展儿童天性的观点与其不谋而合,卫氏还进一步认为蒙氏教育与其在阅读儒家经典中所得到的感悟有相似之处,不过后者比蒙氏教育更加自然。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向往,以及

对近代西方文明过度重视理性的不满,卫西琴决定前往中国。

1913年卫西琴来华,初到中国的一年间,卫氏积极发表演讲,演讲内容不仅有他的教育理念,还包含了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因而引起了当时支持“孔教”的人士注意,不过彼时尚未获得广泛的关注。卫氏的中文名卫中,意为保卫中庸文化,<sup>③</sup>字西琴,其最为时人和后人熟知的名字即是卫西琴。卫氏最初为国人所熟知,乃是由于1914年大翻译家严复翻译了其作品《中国教育议》,因而罗家伦在文章中嘲讽卫氏的同时,也讥讽了后来列名筹安会“六君子”的严复。《中国教育议》发表之后,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外国青年卫西琴一时瞩目于士林,并受邀到不同地方演讲其教育理念。随着他的“走红”,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他的言论,特别是他尊崇孔子的言论成为主张新文化的新派人士所批判的对象之一。

1914—1919年卫西琴声名鹊起,其间中国思想界<sup>④</sup>内部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之争,以及当中新旧杂陈的状况,许多学者都已有过详细论证。王奇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指出当时所谓的“新旧之争”是通过大众媒体的渲染、炒作出现的,趋新和守旧之间本非一成不变,新、旧文化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sup>⑤</sup>章清在对“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状况的研究中曾提到1920年时瞿秋白指出到如今旧的势力已经宣告无战争力,<sup>⑥</sup>民初“新旧之争”遂以新派的胜利暂时落下帷幕。关于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新旧之争”,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未被厘清,即“新文化”的定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新旧两派同样重要。不知道何谓“新文化”,就不能确定什么是“旧文化”,崇新与守旧都无从谈起。卫西琴作为一名在欧洲接受训练的学者,他的教育改革方案实际上奠基于欧洲最新的教育学、心理学,然而他又热衷于表达对孔子学说的尊崇,这样一来,就难以确定他属于趋新或是守旧的一端。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研究原本不受关注的人物或群体来展现这段历史,这并不是要碎片化地研究历史细节,而是从更多的角度来展现历史复杂的面相。

## 一、卫西琴的“新教育”

近代中国的教育转型经历了清末的以日为师到20世纪20年代的以美国教育模式为主导的过程。民国初建的数年间,来自外部的各种教育思想在中国呈现出一种多元发展的态势。卫西琴正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中国,并积极在华宣传他的“新教育”。卫西琴的“新教育”不同于1919年后以《新教育》杂志为中心展开的“新教育运动”中所主张的新教育,卫氏在教育心理和教学法上是自成一派的,下文提及卫氏的“新教育”乃是对其在华期间所发表的教育改革观念与方法的一个总称。虽然卫西琴力倡改革中国当时的教育状况,但是并不是要以西方的教育为模板改造中国教育,相反,他的“新教育”中既有西方最新的教育学知识,又十分重视孔子学说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新教育改革运动,该运动的普遍特征是注重发展的自然本性,蒙台梭利于1907年在意大利创立“儿童之家”,正是从感觉训练出发,重视儿童本性的发展,随后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法传播至全世界。<sup>⑦</sup>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1913年,民国时期影响力颇大的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在此后十余年间刊载了多篇介绍蒙氏及其教育学的文章;<sup>⑧</sup>1914年,江苏省教育会还成立了“蒙台梭利教育法研究会”。<sup>⑨</sup>在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教育刊物和教育会以及教育家们的宣传下,蒙台梭利的方法在民初中国形成了不小的影响力。

与蒙氏教育法类似,卫西琴的“新教育”同样注重发展人的感官能力,强调教育的过程是培养能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卫氏的教育观点最初广泛为国人所知乃是由于1914年春,由严复为其翻译的《中国教育议》在《庸言》上发表。彼时严复已经是鼎鼎大名的思想家、翻译家,借助译者的名声,卫氏在中国思想界很快获得关注。得益于《中国教育议》的“走红”,卫西琴的教育理念受到各个教育会的关注,成为各教育会邀请演讲的中外名人之一。在这些有全国性影响力的教育会上的演

讲,又使其更加受到关注。卫西琴的演讲经由他人翻译,发表在各大刊物上,借助大众媒体传播到更多的人群中。与此同时,民国初年蒙台梭利教育学在各大教育杂志及教育家们的推广下得以迅速传播,卫西琴的文章和演讲中,对蒙台梭利的教育学十分推崇,这也有助于卫西琴获得教育界主流人士的关注。

实际上,卫西琴早在来华之前就已经与蒙台梭利相识,“在英国因为研究东方音乐中包括的东方的精神往外的表示法,让我遇着蒙台梭利所倡的教育心理学说。蒙台梭利的眼光同我一样,也看外面活动不算下等的,是应与精神生关系的。……惟有东方文化的道理当找变化音以外物质的办法,而蒙台梭利的教育心理,则助我用此方法以谋进行。”<sup>⑩</sup>蒙台梭利的教育心理学和教学法是在生物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并且她还是一位基督徒,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卫西琴虽然赞同蒙台梭利以培养儿童感觉为主的教学法,但同时他也主张教育应与基督教脱离关系,在他看来,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还未完全脱离宗教的桎梏。<sup>⑪</sup>因此卫西琴在推崇蒙台梭利教育学时,特别提醒“吾曩所言之蒙特苏里 Dr. Montessori 法亦宜取其偏而不用其全。……蒙特苏里医也,而非专门于心理学,坐此其术往往多歧。……所幸中国有至大之心理学家,所谓生民未有者可以利用,则孔子是已”。<sup>⑫</sup>卫西琴认为他所理解的“孔子之道”不受宗教约束,更加自然,配合蒙台梭利的教育学,以及卫氏自己由音乐中领悟、总结出的心理学观点,共同形成了卫西琴的“新教育”。

1915年,卫西琴受邀到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演讲,是次演讲题为《中国须采用之教育论说》,该演讲后由陈家麟翻译并发表在杭州的《教育周报》上。演讲的核心内容是推介蒙台梭利的教学法,“今中国须得一种新教育,为泰西新发明者,合中人之心理与西人之心理折中而得其中,则我所提倡孟提索雷之教育是矣”,<sup>⑬</sup>卫氏在此次演讲中仍是宣传此前在《中国教育议》里提出的结合孔子“心理学”与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不过与此前的“崇孔”言论有了微

妙的分别。此次演讲中,卫氏开始更倾向于介绍蒙台梭利的教学法,并认为“孔圣人不免空言,孟提索雷专讲实施”。<sup>⑭</sup>卫西琴这种微妙的变化,或许是应因当时蒙台梭利教育学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逐渐扩大的风气。

1916年,卫西琴完成了新作《新教育议》,由于其时严复正在病中,于是推荐王云五为卫西琴翻译,并发表于《教育公报》上。<sup>⑮</sup>书出版后,再度引发全国教育界的瞩目,并且更胜于两年前。吴稚晖曾说:“我国近时受美人卫西琴氏《新教育论》之影响,致年来教育部派遣学生,取限制主义。”<sup>⑯</sup>1916年至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南通师范等教育社团、学校纷纷邀请卫氏前去讲座。在南通女师范演讲后,卫西琴还召开谈话会,积极与学生们互动。1917年初,其受江苏省教育会邀请,进行连续三日的演讲,并由该会介绍到上海总商会演讲。《新教育议》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教育理念,该书的观点在卫氏此前的文章、书籍、讲演中大都能找到。民初的社会环境为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传入中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卫西琴的“新教育”被视作西方的“舶来品”而获得关注。虽然作者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关注,但是《新教育议》的内容不见有人讨论或引用,在教育界探讨教育改革时,也几乎未见有人提及卫西琴。吴稚晖认为卫西琴影响了教育部的政策制定,并没有其他佐证。

除了与蒙台梭利的教育学相应和,卫西琴的教育理念中还有一部分内容回应了“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已有研究指出教育史学界总结的“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不同于后来由杜威掀起的实用主义教育潮流,“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是在振兴实业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以实利主义教育和实用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改革思潮。<sup>⑰</sup>实利主义教育将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挂钩,以区别于中国传统重德不重利的教育。1913年黄炎培发表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提出教育应当注重实用,与实际生活产生联系,<sup>⑱</sup>将实利主义教育进一步推进到实用主义教育的阶段。实用主义教育更侧重于将教育与



学生的日常生活、职业发展联系起来。实用主义教育在民初教育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15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实业教育进行计划案》,<sup>①</sup>此时的中国教育界中,实用主义正蔚然成风。卫西琴在《中国教育议》中就曾提出教育应与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还讨论过实业教育,“中国可由家庭教育而得工艺之教育,工艺教育即是实业教育”,而实业教育为中国所不容刻缓者。<sup>②</sup>可以说,《中国教育议》中所提倡的教育与实践相结合,正回应了1913-1914年间全国蔚为流行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这也是卫西琴的教育理念受到中国教育界注意的一个原因。

1915年赴美考察归来后,黄炎培发表了数篇文章,介绍美国的职业教育。<sup>③</sup>1917年黄炎培发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文中说道:“从前注入时代,实用主义风行中土,鄙人亦为其中绝对赞成者之一。由今思之,已觉不甚切合。所谓实用者,不过智识上之实用,于直接谋生之能力,尚未能发展一二。……吾侪所主张,一方提倡职业教育,俾于生活上速立补救之计划;一方犹当尽力改良普通教科,使归实用,庶其有济。”<sup>④</sup>黄炎培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是为了使平民获得可以谋生的一技之长。1917年,蔡元培、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多将重点放在解决就业问题上。从“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的实利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教育再到后来的职业教育,或以发展工商业,或以发展职业技能为目的,都有很强的功利取向。虽然卫西琴提倡的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等观点与实用主义教育有很多相似之处,并曾到上海总商会等处演讲教育与工商业发展的关系,但是在卫西琴看来,民初中国教育界所谓的实用主义教育仅是一种悬浮的理论。“新教育者应用自然之法,须授以发展其能力……其有所谓职业教育者,实无发展能力之效果,而未流多归于失败。”<sup>⑤</sup>虽然卫西琴的“新教育”也强调培养学生的日用知识和动手能力,而不仅仅是传授理论知识,易使人联想到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然而,他所说的实用“并非注意实际效用之谓,而是注意人有本领,尤其注意本领之

根本,即力量”,<sup>⑥</sup>当中不仅缺少“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明显的功利倾向,也并非出于振兴实业以救国的目的而提出。

1919年《新教育》杂志创刊后,陶行知、蒋梦麟、胡适等人积极安排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并在该杂志上集中宣传杜威的教育思想,为其造势。该杂志之后还陆续介绍了美国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法,并陆续安排了孟禄等多位美国教育家访华,其中当属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最大。美国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结束了民初中国教育改革思想多元发展的态势。卫西琴的“新教育”与陶行知、蒋梦麟等杜威高足所主张的新教育相去甚远,在后者的强劲势头下,前者很快在中国教育界的主流中失去踪迹。

民初中国教育界中,各种教育改革思想纷至沓来,卫西琴因严复为其翻译的《中国教育议》受到关注,后又因其教育思想回应了当时流行的某些教育思潮,得到了中国教育界的持续关注。然而,当时虽有不少教育会、学校邀请卫氏演说其教育观念,但是真正了解卫氏教育理念的人士几乎没有。具体表现在教育界邀请卫氏演讲的人不少,报刊上刊登卫氏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也不少,但是讨论他提出的各种教育理念和教学法的人几乎没有,亦未见有人反驳他的教育理念。时人只是将卫西琴言论的表面意思附会到当时流行的教育学说上,并未深究其“新教育”与蒙台梭利的教育学,又或是“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中的教育思想有何关系。卫西琴的“新教育”在民初教育改革中扮演的不过是一个“舶来品”的角色,它满足的是教育界需要新思想来促成中国教育现代转型的迫切愿望。

## 二、《中国教育议》受到青睐

“国人之知先生者,大抵以侯官严先生所为译《中国教育议》一文”,<sup>⑦</sup>梁漱溟在1926年回忆卫西琴时如是说,此书在卫氏的中国生涯中的地位不必赘言。1914年初,卫西琴带着几份文稿拜见严复,<sup>⑧</sup>“谓其怀来,将以救一国之亡,顾以所论投人,落落

然徒见姗笑,而莫有合……仆闻其语,适然惊疑”,<sup>②</sup>一位外国青年如此关心中国教育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严复不由对此感到惊异,最终决定替他翻译《中国教育议》。自晚清时期设立洋务学堂起,中国开始了由上而下进行教育变革的探索。及至民国建立,教育总长蔡元培继续改革教育,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也都认可教育变革的意义,民初出现了一股讨论不同教育流派、教学法等教育变革内容的潮流。这种自上而下并且不同的知识精英都认可的教育改革潮流,是出于相信培养人才才是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将教育与救国联系在一起也是严复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想法。作为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论”的信奉者,严复相信个体的提升对于群体的发展至关重要,而教育正是个体提升的重要途径。清末民初教育救国的思潮更多是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作为救国的途径,然而也有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人认为儒家道德与人文传统在现代国家中依然具有维持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认同、延续中国文明的价值。<sup>③</sup>晚年的严复,不仅延续了教育是救国的出路这一想法,还主张以儒家传统伦理作为挽救世俗人心的办法。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不仅介绍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还提倡从孔子学说中汲取资源,这无疑正符合严复当时的需要。

《中国教育议》的核心观点就是极力反对中国教育模仿日本或欧洲现行的“死法教育”,主张中国建立独立的教育系统,并将教育独立视为国命之所系。欧洲现行主流教育的问题在于“多识事实而已……致少年人有物质功利之思想而无灵魂感情赏会全不发生而乏甚高之韵”,<sup>④</sup>至于日本教育模仿德国教育体系则流弊更甚。按照卫氏的说法,“中国于神明之学至足而所短者在物质之新知。欧美于物质之学过多而所少者在神明之要道”,<sup>⑤</sup>所以东西文化的会合点即是“将中国固有的‘心理学’<sup>⑥</sup>与西方的物质文明结合成一个新的世界文化。卫氏认为应该以蒙台梭利的教学法加上中国固有的‘心理学’:‘仆察中国之民性,固不必借径于欧洲之旧法教育,凡学

必由心识而后为躬行但用蒙氏之教育术自可立致知行合一之妙。”<sup>⑦</sup>书中首先介绍了蒙台梭利的教育学。蒙氏的教育学强调儿童天性的充分发挥;重视家庭教育;注重由培养个人的身体能力入手到个人的精神、道德层面的提升;重视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在卫氏看来皆与“孔子之道”相符。蒙台梭利的教学心理学是当时欧洲教育学最新的成果之一,卫氏证明蒙氏与孔子的相似,是为了说明欧洲最先进的文化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可以找到,“今所敬告者,使公等而真知实行孔氏之教育则古今欧洲最良之法已为公等所熟知”。<sup>⑧</sup>卫西琴在该书中对中国教育改良的建议可以总结为:以孔子的“心理学”为中国人“中国固有的心理学”,再通过“蒙台梭利之方法”发展中国人的身体能力,最终达到精神与物质大通的自然境界。

严复对中西两方文化资源的取舍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维护和加强民族国家,而严复对于教育的重视也不是在晚年才出现的倾向。早在晚清时期,严复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中就已经体悟到了个体发展对于全体的重要性,因而严复早已提出提高民智、民力和民德的重要性。<sup>⑨</sup>1895年及1896年发表的《原强》与《原强修订稿》中,严复已经说明“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sup>⑩</sup>而教育的三个层面:体育、智育和德育,正是对应了严复所说的民力、民智和民德。至于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则在于教育决定了一国种群的素质,而一国种群的素质又决定了该国在当今世界的存亡。“考五洲之历史,凡国种之灭绝,或为他种所羸者,不出三事:必其种之寡弱,而不能强立者也;必其种之暗昧,不明物理者也;终之必其种之恶劣,而四维不张者也。”<sup>⑪</sup>教育决定个体的素质,个体的素质又关系到国家、种群的兴亡,这一因果关系在严复那里早已确立。无论卫西琴的“新教育”是否是为了挽救中国国家危亡而作,严复都愿意将其作为教育救国的一条出路加以推阐。

崔运武是国内较早专门研究严复教育思想的学者,他指出晚年的严复看到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后,发现当中有“赞美孔子,宣扬中国传统道德的思想”,于是严复“就引为同道,将全书翻译出来”。<sup>⑤</sup>教育与尊孔的联系,1906年严复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中也已经阐明。“凡国之亡,必其人心先坏……不佞目睹今日之人心风俗,窃谓此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骤闻新奇可喜之谈,今日所以为极是者,取而行之,情见弊生,往往悔之无及……不如一切守其旧者,以为行己与人之大法,五伦之中,孔孟所言,无一可背”。<sup>⑥</sup>在民国成立以前,严复已经察觉社会上崇拜西学、鄙薄中学的风气,并认为“人心不古”是造成当今社会危亡的原因。因此,严复提出教育的三个层面中,德育最为重要,因为德育是用来教化风俗的,而德育的基础就在于孔孟学说中的伦理道德。

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决定废止祀孔读经,儒学失去了最后的政治凭借,社会上反对传统文化的声音亦越来越强烈。崔运武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民初乱象使严复愈发渴望稳定,于是转向强人政治,在需要强调威权的情况下,自然不会再倡导西方的自由观念,但是社会道德价值观不能够处于真空状态,于是他转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与“孝”当中去寻找“新民德”的来源。<sup>⑦</sup>其实,严复在民国初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道德伦理,并不是一种“转向”,因为严复从来都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者’”。<sup>⑧</sup>民初中国社会失去道德权威后陷入一种彷徨,儒家伦理作为中国自古以来的道德基础,在急需凝聚人心的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严复在民初崇儒不是一种倒退,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做出的选择。卫西琴在《中国教育议》中不仅强调孔子学说对于维持中国特性的意义,还提出孔子学说与西方的最新思想成果并不抵触,且有助于西方现代思想深入发展。严复借卫西琴之口正是要向国民传递儒家思想对于挽救人心风俗的意义、对于凝聚国民的意义,以及儒家思想作为一个抽象的理论与现代性是可以兼

容的。如果连一个西方人都能理解到儒家思想之于现代中国的重大意义,中国人更加没有理由理解不了这一点。

严复在《中国教育议》“译者案”的最后一段写道:“孟德斯鸠不云乎,立宪之民不必其能决事也,但使于国事一一向心脑中作一旋转便已至佳。惟卫君愿宏,若仆之所求则不过如是而已。”<sup>⑨</sup>严复言其所求“不过如是而已”指的是他认为目前国民教育目标不必追求过高,民众仅需略具知识水平能够思考国情即可,“鄙见此时代学务,所亟求者,宜在普及。欲普及,其程度不得不取其极低”。<sup>⑩</sup>卫西琴的“宏愿”则是要培养身体、精神皆佳,且能够身心互通并创造新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人。根据蒙台梭利的方法,一切教育需要顺应儿童的天性,那么卫氏的教育理念中首先要培养的是天资优异的那批儿童而非全体民众,“须先栽植优等生,劣者则须别设补助学校而不能不有所待也”。<sup>⑪</sup>严复是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提出教育的重要性,因而教育的目的自然指向了救亡图存;卫西琴没有这样的心理,使人人得到全面发展才是他提倡教育的目的。严复在《中国教育议》的“译者案”中明言:“其所言,虽不必尽合吾意,顾极推尊孔氏。以异种殊化,居数千载之后,若得其用心,中间如倡成己之说,以破仿效与自由。”<sup>⑫</sup>可以看出,严复乃是从实用的视角来看待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他借着卫西琴之口来申明教育与儒家思想资源是救国与挽救人心的关键所在。

卫西琴的教育理念孱杂了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内容,既有欧洲最新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内容,又有他对孔子学说的独特理解。虽然本文以“新教育”概括卫氏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但实际他并没有一个类似其他教育家那样完整的教育观。卫西琴的“新教育”中虽然有不少尊孔的言论,但他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理解本质上也不不同于当时维护旧教育、旧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他提出孔子的“心理学”很符合他的想法,但是他的教育心理和教学法实际上主要还是受益于他在欧洲接受的心理学的训练,以及他对当时最新的蒙台梭利教学法的理解。卫氏的这



段经历最吊诡的地方在于,主张“新文化”和主张“旧文化”的人士都能在他那里找到资源,更显出民初思想界中“新”“旧”之间竞争激烈又交缠不清的景象。

### 三、卫西琴的“尊孔”言行受批判

王奇生在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中曾指出,1918年初至1919年初,经过陈独秀一番“炒作”,“新旧之争”逐渐成为社会话题,“新派”、“新文化”与《新青年》三者也声势渐隆。<sup>⑤</sup>“新旧之争”既然是被大众媒体炒作出来的,就能解释为何卫西琴的尊孔言论会在1918年又重新被注意到。卫西琴的尊孔言论早于1914年已经受到易白沙的批判,但并没有影响到各大教育会演讲,就笔者所见,此后数年似乎也无人再抨击卫氏的尊孔言论。直至1918年第5卷第4期的《新青年》中,有一篇傅斯年撰写的文章讽刺卫西琴尊孔是为了取悦国人,再到第二年十月出版的《新潮》中罗家伦更加直接地批评了卫西琴的尊孔言行。卫西琴的尊孔言论时隔数年后被再次批判,与王奇生提到的《新青年》及其同人因炒作新旧之争而声名大震的时间段一致,恰反映出民初的“新旧之争”更多地取决于立场的不同而非观点的不同。

卫西琴与“孔教”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913年春,彼时卫氏初到上海,最早接触的华人群体乃是寰球中国学生会与孔教会的人士。1913年3月至4月,卫氏曾两度受邀到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演讲,题目均为“Regeneration Through Education”(通过教育再生)。之后,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会长李登辉请陈焕章将该演讲翻译“以推阐之”,陈氏后以《教育当以孔子为主》为题名,将卫氏的演讲翻译后发表在了5月份的《孔教会杂志》上。卫氏演讲的原题目并没有特别突出孔子,陈氏的译文标题却将孔子当成了中心,这当中的转换并非仅是翻译策略上的选择这么简单,背后反映的是孔教会的骨干陈焕章借西人之口崇儒,以便推进“孔教运动”的目的。虽然在寰球中国学生会演讲过程中,卫西琴的确对孔子之道称赞不已,但无论是其演讲的英文题目,抑或是演讲内容,他的重心都是在教育而非孔子身上。卫氏在演讲中称赞中国教育的原因是中国固有的教育体系符合他的“新

教育”,换言之,卫氏乃是首先形成了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新教育”理念,然后才在“孔子之道”中找到对应的内容。<sup>⑥</sup>陈焕章的译文正文其实并没有刻意删改卫氏原文为其他目的服务,但是译文的标题以孔子为中心,开头译者还介绍了作者“威士赫君”,说他“言必称孔子凡论中国文明皆以孔子为代表”,<sup>⑦</sup>这些已经造成了卫西琴是孔子拥趸的印象。实际上,卫西琴对儒学的理解与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比如就其所言孔子是一位心理学家一说,在中国人听来恐怕不可思议。然而即便如此,卫氏依旧卷进了民初思想界的新旧之争的旋涡中。

《中国教育议》发表后,当中“尊孔”的言论引起了时人的注意,最先出面反驳卫西琴的是易白沙。《中国教育议》于1914年4月连载完毕,易白沙在6月出版的《甲寅》上即发表了一篇驳论文章——《教育与卫西琴》。易白沙认为卫氏此文之所以能够受到广泛的关注,严复之所以为其翻译,原因皆在于二人想要迎合全国上下之心理,“虽然卫氏之言,因全国上下之心理之趋向而言者也,严译亦因全国上下心理之趋向而译者也。言者译者,既合于全国心理之趋向,其影响所及,可以推知”。<sup>⑧</sup>易白沙文章开头先肯定卫西琴“反复推尊中国孔子,心存千载之上,眼光百世之后,发为说言,足以招黄魂……”,接着笔锋一转,又认为“卫氏倡议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挟尊孔之道,以干当世。……此仅如群蛙喧夜之中,增一蚯蚓之吟暗而已矣。愚读其文,深惜此西山之凤鸣非其时耳”。<sup>⑨</sup>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卫西琴尊孔,只不过他认为在共和时代主张尊孔实在不合时宜,至于卫西琴主张用在教育改革中采用孔子的思想,不仅不现实,还有碍于中国教育实行欧化。易氏对于卫氏“举儒家以抹杀诸子”更深感不忿,并列举了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教育主张,以证明卫氏“非真知中国之教育也”。<sup>⑩</sup>

1916年2月和9月,易白沙在《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上分别发表了《孔子平议》的上篇和下篇。此文更加明显地表达了易白沙对孔子的态度。该文上篇的主要观点是孔子的学说长久以来被“野心家”所

利用,成为控制人民的傀儡,孔学不仅不能挽救人心,甚至“人心风俗即崩离于此”。<sup>⑤</sup>下篇的主要观点是表达孔子一家学术不能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孔子与国学绝然不同”。<sup>⑥</sup>两年前易白沙反驳卫西琴尊孔的重点之一就是反对卫氏将孔子学说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代表,并由此进一步以尊孔为挽救时弊的方法这一言论。易白沙要反驳的不仅仅是卫西琴,还有其他相信“欲正人心端风俗励学问非人人崇拜孔子无以收拾末流”<sup>⑦</sup>的群体。易白沙这类主张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的人士,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孔子学说无论曾经有多辉煌,在当今共和时代已经不合时宜,“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易白沙对卫西琴尊孔的态度,就如同他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一样带着一丝矛盾。他并不否定孔子和儒学之于中国的意义,但他出于某种“救亡”的急迫感,又急于摆脱这些“旧文化”,然而他并没有说明能取代“旧文化”的“新文化”是什么。

《每周评论》和《新潮》创刊后,两刊与《新青年》一起产生了群体效应,新文化运动也在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全国性的规模。<sup>⑧</sup>新文化的地位逐渐上升,新旧之争也就更加激烈。当时所谓的“新旧思潮冲突”“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问题”<sup>⑨</sup>最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因而也是新派杂志同人乐意探讨的话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卫西琴的尊孔言论在时隔四年后被重新拿出来批判,而批判者正是《新青年》同人团体。1918年10月,傅斯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篇讨论戏剧改良的文章末尾,讥讽卫西琴是迎合了一群想要听到“西洋人恭维中国事情”的“善会人意的乖觉儿”。<sup>⑩</sup>《新潮》作为在陈独秀和胡适的指导下创办的学生杂志,不仅继承了《新青年》的批孔和文学革命,而且言辞更加激烈。1919年10月,罗家伦在《新潮》上刊发的《学术界的骗局:骗中国人和骗外国人》一文更为直接地批判了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并统称他们为“骗子”。罗文中,卫西琴首当其冲。罗家伦认为卫西琴是“揣摩中国人复古的心理,做了一本什么教育学”的阿谀之辈。接着他还指出卫氏认为“君主是好的,宰相也是好的,中

国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又说“袁皇帝见了,果然‘龙颜大悦’送他一个顾问”。卫氏此前的言论中从未称赞过中国的君主制和宰相制度,相反他十分反对君主时代的专制,亦未曾担任过袁世凯的顾问,罗家伦恐怕是将卫西琴与袁世凯真正的外国顾问古德诺混为一谈。罗家伦后文中批判的对象还包括翟理思、陈焕章、辜鸿铭,并认为除了最近到中国讲学的杜威博士和以政治学著名的芮恩施公使外,在华的外国人没有一位称得上是学者。<sup>⑪</sup>傅斯年与罗家伦二人恐怕并未读过卫西琴的文字,至少可以说他们没有认真读过,但此时他们已不需要如四年前的易白沙那般详细地反驳卫氏。因为到此时,新文化和新派在“新旧之争”中已经占据上风,作为新派的新生代力量,傅斯年和罗家伦抨击卫西琴尊孔自是不遗余力,至于卫西琴的“新教育”是否属于新文化,并不纳入他们的考虑当中。

### 结语

十几年后,卫西琴回忆民初的这段经历时,说道:“故有谓卫中其人,乃故作惊奇语,以实施真欺骗中国之惯技者,实则彼时贩贩西洋学者势盛;西人亦多炫口其物质文明,来投所好,以欺华人。愚为斯言,自应遭热中功利者之物议。”<sup>⑫</sup>当年傅斯年、罗家伦批评卫氏谄媚国人,可在在他看来,那些盲目追求“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士才是别有用心。卫西琴在民初的几年间,经历了中国思想界新旧杂陈、新旧之争到新派逐渐占据上风的转变,然而何为“新思想”“新文化”却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果“旧文化”指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的文化,那么“新文化”是否就是指所有来自中国以外的文化?那么卫西琴的教育理念里包含着欧洲最新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成果,又何尝不是“新文化”,又何以以为新派人士所抨击?

民初数年间卫西琴虽受邀四处演讲其教育理念,但在表面风光的背后,无人真正地讨论过他的教育改革思想。作者本人一度受到追捧而作者的思想却无人问津——卫西琴的遭遇反映的是在民初教育转型的过程里,时人渴望汲取更多的新观念、新想法,但对何谓“新”、“新”在哪儿,没有一个清晰的标



准。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潮流指向的其实都是“救国”这一更大的时代主题。严复看中了卫西琴提出的孔子学说可以为中国新教育奠基的想法,这一想法证明儒家思想不仅与现代性不相抵触反而有助于现代化的进行。这可以说正中当时主张挽救儒家传统以挽救世俗人心、恢复社会秩序的保守人士下怀。对于严复来说,无论是重视教育,抑或是强调儒家传统的价值,其出发点和目的都在于救国。可是,卫西琴要回应的并不是“救国”这个时代主题,他希望以他的方法和理念来改革中国教育,所谓“尊孔”的言论也是基于他相信儒家思想中有与他的教育思想相应和的地方。

尽管如此,不同立场的人士却都可以在他的言论中找到可资利用的内容。崇新的人士可以在他那里获得西方学界最新的教育思想,复古的人士也可以从他的尊孔言论中获得满足——儒家文化与现代思想不仅不相抵触,而且能够在塑造人格、规范社会秩序上发挥重要的作用。1919年前后,随着“新文化派”声势渐隆,“新旧之争”也在大众媒体的渲染下成为焦点。由于此前卫西琴的名气及其外国人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数年前尊孔的言论重新进入新派人士的视野,成为新派人士用以抨击保守人士的标靶之一。主张“新教育”的卫西琴就这样被归类为食古不化的守旧一派,而他外国人的身份则更令人怀疑他尊孔的动机不纯。1920年之后,中国思想界的“新旧之争”胜负已分,既然新文化的势力已经占据上风,新派人士也就不必再以卫西琴的尊孔为“靶”来攻击旧派人士,而后者欲翻身,卫西琴这个“外援”显然不够有力。因此1920年之后,中国主流思想界,无论是新派还是旧派,都不再关注卫西琴。<sup>⑤</sup>

卫西琴作为一名外国学者,虽然他积极地对当时重大的时代议题发表意见,但由于其缺少主导舆论、确立典范的能力,他的各种言论何时为思想界主流所注意、哪些内容将会引起讨论,几乎不在他的掌控和预测中。卫西琴在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浮沉向我们展示了当时各方人士对于何谓新文化实际上莫衷一是,如何界定新文化与旧文化不仅在于观点的不

同,更多地取决于立场的不同,而他这样一个在新旧之间的人物也为我们界定新、旧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

#### 注释:

①志希:《学术界的骗局:骗中国人和骗外国人》,《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2月,第343页。

②黄冬的《卫西琴研究状况及研究新探》(《教育史研究》2019年第1期)一文解决了笔者对卫西琴身世的多个困惑。此文在卫西琴研究中具有先导性的作用,但此文并未对卫西琴的思想、行动做任何分析,仅止于阐述卫氏研究状况和资料状况。

③吉范五:《记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第14-25辑,1999,第734页。

④本文对“思想界”的定义来自章清,思想界是思想人物活动的舞台,包括不同“界”的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读书人),而出版物与大学即是思想界人士的舞台,展现了他们不同的生活形态和思想内容。章清:《由“学战”到“思想战”:民国时期的思想与学术》,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920-953页。

⑤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⑥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⑦钟启泉:《20世纪初的新教育运动》,《基础教育课程》2016年第15期。

⑧时松:《蒙台梭利教育思想与方法在近代中国》,《教育科学》2015年第2期。

⑨田正平:《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纪念蒙台梭利“儿童之家”创办一百周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⑩卫中先生口述,张俶知笔记,梁漱溟笺释《卫中先生的自述(续)》,1926年3月6日,第14页。

⑪卫中博士演讲,杜太为笔记《教育名教与教育》,《广东省教育会杂志》第1卷第2期,1929年2月,第98-99页。

⑫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3期,1914年3月,第13页。

⑬《卫西琴先生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之演说:中国必须采用之教育论说》,陈家麟译,《教育周报》第84期,1915年,第28页。

⑭《卫西琴先生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之演说:中国必须采用之教育论说》,《教育国报》,第84期,1915年,第28页。

⑮王云五著,王学哲编《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65页。

⑯吴敬恒:《论旅欧俭学之情形及移家就学之生活》,《新青年》第4卷第2期,1918年2月,第169页。

⑰吴洪成、许晓明:《民初早期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述论》,《河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⑱黄炎培:《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时报》1913年10月21日,第6张。

⑲《文牍:致各省教育会分送联合会议案书:提议实业教育进行计划案》,《教育研究》第20期,1915年2月,第4-7页。

⑳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4期,1914年3月,第13页。

㉑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下册,第897页。

㉒黄炎培:《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教育杂志》第9卷第1号,1917年1月,第17页。

㉓素:《卫西琴博士之教育谈(四):教育为农工商之基础》,《时报》1917年2月9日,第3张。

㉔梁漱溟:《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4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第816页。

㉕梁漱溟:《〈卫中先生自述〉题序》,《晨报副刊》1926年3

月3日,第5页。

㉖1971年,梁漱溟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卫西琴于欧战爆发后失去来自德国家中的经济支援,多次投书严复请求为其翻译,并说自己将要自杀,严复遂复信答应为其翻译。梁漱溟:《卫西琴先生传略》,《梁漱溟全集》第7卷,第235页。艾恺在其研究梁漱溟的专著中,提及梁与卫西琴的交往时也转述了同样的内容。[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245-246页。但是,《中国教育议》最初于1914年3月开始在《庸言》上连载,而一战的爆发乃是由于6月底斐迪南大夫妇被枪杀引起的。因而,梁漱溟所说的卫西琴因一战爆发得不到家中资助,困顿失意下要自杀,严复才同意为他翻译,在时间上就是不成立的。

㉗严几道:《卫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国教育议(译者案)》,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568页。

㉘段炼:《文化认同与国家忠诚:民初道德观念的思想分途》,《危机与转机:清末民初的道德、政治与知识人》,九州出版社,2022,第122-164页。

㉙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3期,1914年3月,第2-3页。

㉚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3期,1914年3月,第10页。

㉛卫西琴曾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看作是心理学上敢于突破成见的改革家,“孔子老聃释迦牟尼者心理学之刻百尔加理辽与奈端也”。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3期,1914年3月,第6页。

㉜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4期,1914年3月,第7页。

㉝卫西琴著,严几道译《中国教育议》,《庸言》第2卷第3期,1914年3月,第14页。

㉞[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三章。

㉟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第25页。

⑳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179页。

㉑崔运武:《严复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第25页。

㉒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严复全集》卷七,第180页。

㉓崔运武:《严复教育思想研究》,第25-26页。

㉔美|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34页。

㉕严几道:《卫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国教育议(译者案)》,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第569页。

㉖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七,第180页。

㉗《卫西琴先生关于教育之言论》,《南通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7期,1917年9月,第2页。

㉘严几道:《卫西琴 Dr. Alfred Westharp 中国教育议(译者案)》,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卷五,第568页。

㉙1918年3月,钱玄同与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唱“双簧”,使孔子与文学革命成为话题,引起各方讨论,到第二年初,林琴南与蔡元培的“新旧之争”更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在新闻媒体的渲染下,“新旧之争”和《新青年》及其同人都声名大噪。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㉚ Dr. Westharp, "Tribute Is Paid To Chinese Education", The China Press, April 26, 1913, p. 5.

㉛威士赫:《教育当以孔子为主》,陈焕章译,《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4期,1913年5月,第1页。“威士赫”即 Westharp 的音译,在卫西琴拥有中文名之前,各大报章杂志对其英文名的音译并不统一,出现威士赫、韦斯哈、魏沙泼等多种译法。

㉜白沙:《教育与卫西琴》,《甲寅》(东京)第1卷第2号,1914年5月,第12-13页。李岩曾指出易白沙是从“战时暂时文化策略”的角度,指出卫西琴那种重视心理的教育会妨碍物质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在竞争中失败,但易白沙又强调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相当于否定了物质教育,所以二人最后殊途同归。李岩:《音教争执——以辛亥前后“音乐教育”为例》,《黄钟》2011年第4期。

㉝白沙:《教育与卫西琴》,《甲寅》(东京)第1卷第2号,1914年5月,第12页。

㉞白沙:《教育与卫西琴》,《甲寅》(东京)第1卷第2号,1914年5月,第13-14页。

㉟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期,1916年2月,第14-19页。

㊱易白沙:《孔子平议(下)》,《新青年》第2卷第1期,1916年9月,第27-36页。

㊲易白沙:《孔子平议(上)》,《青年杂志》第1卷第6期,1916年2月,第14页。

㊳王奇生:《“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㊴隐庐:《新旧思想冲突平议(一)》,《每周评论》1919年4月13日,第2版。

㊵傅斯年:《再论戏剧改良》,《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第358页。

㊶志希:《学术界的骗局:骗中国人和骗外国人》,《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2月,第343-345页。

㊷卫中博士讲,史寅生、杜太为合记《政治与教育》,《晨报副刊》1926年3月24日,第54页。

㊸梁漱溟是一个例外,他与卫西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这只能另文讨论。